

数字时代的  
文化生活

## 将青春融入时代的洪流

谢冕

“要找个人的出路，先找民族的出路”。

这是杨沫小说《青春之歌》中，卢嘉川、许宁与青年同伴们对出路问题的思索和回答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除夕之夜的北平，外面寒风逼人，10余位青年聚在一处热烈交谈，燃起情感与思想上的温暖篝火。他们思念沦陷的东北故乡，痛陈腐败的当局统治，愤恨日寇的侵略，欢呼红军反围剿的胜利，民族的生死存亡与个人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席间旁听的人中就有小说主人公林道静。

据说，这个难忘的除夕之夜是以作家杨沫的亲身经历为底本的。1933年的除夕之夜，杨沫参加了一场进步青年聚会，深深地被他们的爱国热情和他们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引。这一晚因而成为她人生的“急转弯”。

人生的出路问题，曾经摆在我们太多人面前。这是《青春之歌》最让我感同身受的地方。我也经历过旧社会，体会过民穷国弱、受侵略受奴役的滋味，看过土豪劣绅的黑暗勾结，见过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腐败堕落，对社会一面灯红酒绿，另一面路有饿殍的现状愤愤不平。1949年我17岁，正在读中学，家里连隔日的粮食都没有，读书能读到什么时候不知道，读出来会是什么前途也不知道。当年8月，解放军千里进军福建，解放了我的家乡。我亲眼看到进城的解放军军纪严明，对老百姓体恤爱护，心底已经明确地意识到，这才是中国的希望。于是，8月底我就离家参军，跟着大部队一起开拔向南。那是我17

年来第一次离开家乡，背着行囊握着枪，走在队伍中间，天下着雨，黄泥地卷起来的泥浆溅得满身都是，心里面却晴朗得很。

阅读《青春之歌》，常常让我想到那个启程行军的日子，想起入伍之初的心情。我和林道静一样，都是在寻找个人出路的过程中，看到国家的出路所在，都是为着理想走出家门，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《青春之歌》小说发表的那一年，我已经到北京读书了。身边的同学对这部小说几乎是无一例外地称赞。小说描写的北平、北京大学，北大的红楼、教室、东斋西斋，让我觉得无比亲切。杨沫写出了我们共同生活过的环境，写活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年代，她笔下的林道静、卢嘉川、江华、王晓燕、王教授等，是我们的同学、兄长、老师，更是我们的先行者。林道静的故事，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一样，因为它体现着我们的困惑与苦闷，我们的追求与理想，我们想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奋斗与抗争。那时正值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，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出过一本纪念集就叫《战斗中成长》，大家都把卢嘉川、江华当作英雄偶像和先进典型来学习。《青春之歌》就像青年人的革命教科书，教导我们如何生活、如何成长、如何战斗，教导我们哪怕在小学教员的岗位上，都可以成为最英勇最前列的“战士”——关键是将自己的命运和千百万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
我还清晰地记得《青春之歌》中林道静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，如饥似渴地阅读《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》《母亲》等书籍的场景。被革命的火光照耀，被理想的灯塔引领，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青春总是天然地和理想联系在一起。很多年前，作家徐迟跟我说过：你去读一读恩格斯的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吧，那简直就像诗一样啊！后来我去读的时候，发现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，那就是诗，充满诗的热情和感染力，充满理想的光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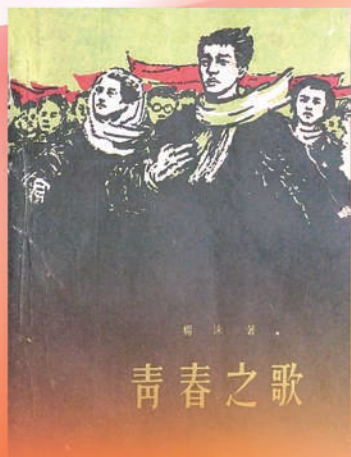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回过头来再看，《青春之歌》的意义，既在于它以文学的方式把一个时代概括了出来，把一个时代的精神提炼了出来，做到生动地保存历史、再现历史；同时还在于，它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时代风云人物形象，这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为几代青年人学习的对象，到现在还深深地激励着我们。不仅仅是《青春之歌》，像《红旗谱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苦菜花》等当时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，都成功塑造出让人过目不忘的经典形象，半个多世纪之后再看，还觉得有力量、有感染力。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！以梁斌、杨沫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，虽然面对这样那样的现实困难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充满热情，甚至是超负荷地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文学贡献，记录下

时代前行的印迹。

今天，我们的时代肯定不乏英雄。脱贫攻坚、探月工程、载人航天，这么多壮举的背后怎么会没有英雄、没有理想、没有生死相许的信念？扶贫英雄、科技标兵、创业先锋，这里面怎么会没有青春的身影和奋斗的旋律？如果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之歌，那么今天的青春之歌还有待更多的书写谱就。

青春如歌似诗，最有激情，也最有创造力。宝贵的青春不应该碌碌无为，而是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，要向着壮丽的未来而进步，要竭尽全力地为社会做贡献。一个人对信念的坚守、对理想的追求，会深深影响同行者甚至后来者。《青春之歌》中，江华这样评价林道静：“无论谁挨着你你都会被你这种热情所感动。”这份融入时代洪流的热情，这份追求理想和光明的热情，注定会感动一代又一代人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本报记者胡妍妍采访整理）

品味  
红色经典⑥

图片从左至右依次为《青春之歌》电影连环画册、小说封面、林道静扮演者谢芳的电影剧照。

制图：蔡华伟

慢直播，熔铸共同文化记忆

张成

这两年，慢直播更多地走进人们生活。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发射、超级日环食、猎户座流星雨，相继开启慢直播新技术；人民日报直播武汉东湖樱花，赏樱者“云”集；人民网慢直播“中国扶贫第一村”福建安溪漂流，观众感受新时代中国农村新风貌；学习强国“云瞰神州”慢直播国内著名景区，带网友“云游”祖国壮美河山。一时间，慢直播火了，它出现在重大新闻现场，带着观众直击重要时刻；也出现在人们向往之的地方，带大家云端感受赏心乐事和如画美景。

慢直播，顾名思义，是对事件及其场景全程不间断的直播，无剪辑、无脚本、无旁白解说、无背景音乐，重在原生态记录。不同于电影、纪录片等由创作者讲故事，在慢直播中，观者自行发现亮点、诠释内容。

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，慢直播是讲好中国故事、熔铸情感共同体的有效方式。慢直播贵在真实，通过持续不断的直播，让观众时时“在场”，随时跟进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各种信息纷杂难辨，朴素原始的直播反而更有力量。直播熊猫的生活起居、直播对珍稀动物朱鹮的保护、直播驯鹿迁徙、直播新疆雪景、直播海洋牧场示范区、直播“漫游”古城、直播通宵织毛衣……这些多议题、多情感维度的慢直播展现着真实世界的丰富多彩。

慢直播贵在凝神聚气，展现巨大的共情力量。相较于传统的单向度传播，慢直播在呈现新闻事件的同时更容易凝聚情感。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，武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，媒体连续多日24小时不间断直播武汉火神山、雷神山医院的建造过程，展示“中国速度”，展现中国力量。亿万观众在线“云监工”，使用“软萌”的流行话语赋予叉车、铲车、压路机、混凝土搅拌车人格特征。乍看单调的生产建造过程，被网友点染出温度，寄托了希望。前一段时间，河北推出“守望石家庄，静待重启日”的24小时慢直播，全国各地的人们守在屏幕前，为石家庄默默加油鼓劲。在这种共情和“云陪伴”中，人们感受到浓浓的温情。

慢直播贵在参与。慢直播具有身临其境的在场感，为广大观众提供交流场域，人们在观看慢直播和在线互动中，强化了共同记忆。如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发射、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慢直播，能够激发广大观众的情感，对重大事件形成难忘的民族记忆。即便在单向传播过程中，受众也强烈渴望共同的情感参与。以阅读小说为例，不少读者会把能够有效激发自己情感的段落和章节反复阅读，以至于将书翻烂。慢直播作为公共领域的新媒介形态，也体现了受众的情感主体性和参与感，是当代人新的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。

追根溯源，这种“提供素材让观众自己讲故事”的慢直播并非全新的传播形态。早在100多年前，电影诞生之初，电影人出于对新媒介和新知觉经验的兴趣，将摄影机固定在火车前窗，旅拍各种城市风景，可谓慢直播的鼻祖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电影人提出用摄像机拍摄普通人的美学理想，开启现实主义电影先河。可以说，慢直播之所以受到欢迎，在于它以更加普及的方式实现人类长久以来的夙愿，即认知世界、理解世界、讲述世界的内在需求。

随着5G、4K、AI、VR等技术的发展，慢直播的技术支持无疑会更加成熟、更加完善。更多中国力量、中国速度、中国形象、中国故事，将通过“云端”慢直播，走向五湖四海。善用科技、善用慢直播，大河奔涌的时代叙事、鲜活生动的百味人生，将一次次唤起共情、凝聚人心，助力建设更加美好的生活。

## 我们的“青春之歌”回声嘹亮

——访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

本报记者 任姗姗 杨雪梅

《青春之歌》，回响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里。

1958年，小说《青春之歌》一经问世，立即成为畅销书。一年后图书销量突破130万册，至今销量超过500万册，先后被翻译成英、法、德等20多种文字。

1959年，电影《青春之歌》全国上映，多地影院观众爆满。在北京，有的影院24小时放映，有人饿着肚子也要通宵排队买票。因为这部电影，抗战时期歌曲《五月的鲜花》再次流行全国。

时隔62年再忆过往，林道静的扮演者、85岁的谢芳感慨说：“小说出版一年后，就拍成了上下两部电影，《青春之歌》是一个奇迹！”

《青春之歌》是谢芳的第一部大银幕作品。在电影中，她塑造了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进步知识分子林道静，堪称当时中国电影史上独一无二的知识女性形象。她与电影《青春之歌》的故事始于24岁。

1959年，在武汉的歌剧演员谢芳接到去北京试镜的任务。此时，她在歌剧舞台已历练9年。“同每次接受新任务一样，我没有胆怯，既然是试镜头，就有试上和试不上两种可能。试上咱就演，试不上就回来演歌剧。”虽然心态坦然，但她对完成好任务的心情是迫切的。

两次试戏，第一次看演员的银幕形象，第二次考察表演能力。崔嵬导演选择剧情中的

两场戏：一场是林道静与余永泽决裂之后，与王晓燕促膝谈心；另一场是林道静入狱后，在胡梦安的威逼利诱下，坚定不屈，拒绝自首。尤其第二场戏份很重，对于角色要求也高。谢芳想，这是要看演员的“硬功夫”了。

谢芳知道，《青春之歌》的小说是成功的，将它搬上银幕是观众的愿望。但当时的她并不了解，有关领导指示：“一定要用最好的胶片，把《青春之歌》拍好”。为寻找饰演林道静的最佳人选，导演崔嵬通过媒体报道，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，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寄来了演员名单。影片能否和小说一样获得成功呢？被搬上银幕后，会更具魅力吗？方方面面的期待，给了影片主创团队巨大的压力，这压力也是动力。

“拍一部电影好比心里捧着一窝水，自始至终要做到滴水不漏，才能使影片获得成功。”谢晋导演的这句话让谢芳认识到，电影《青春之歌》的成功不是偶然的，编导者是重要因素。

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电影《青春之歌》的主创堪称豪华阵容。电影编剧便是小说作者杨沫，崔嵬、陈怀皑为导演；秦怡饰演林红，于是之饰演余永泽，康泰饰演卢嘉川，于洋饰演江华；摄影聂晶曾拍摄《小兵张嘎》；作曲家瞿希贤作曲，指挥家李德伦指挥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主创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。杨沫几乎把所有的热情、思考

和理想倾注于《青春之歌》的写作中，作品中就有她早年参加革命的影子，写的是一代人如何奋斗、如何在时代中成长、如何走向今天的觉醒。她在文章《林道静的道路》中写道：“把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，依照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表现出来。林道静——一个平凡的女孩子，尽管有缺点，尽管还很幼稚，但因为她的道路走对了，她的生命就会变得坚强，就会发出动人的光彩。”崔嵬参加过北平的学生运动和冀中的农民斗争，熟悉当时的历史情况，理解林道静的思想和斗争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。谢芳回忆，拍摄除夕之夜这一场戏时，学生们在白莉苹家中满腔悲愤地高歌《松花江上》，这一幕让在场的演员都哭了，导演哭得最为伤心。瞿希贤为《青春之歌》作曲时，重温自己同时也是林道静走过的道路，在音乐中引入《五月的鲜花》《救亡进行曲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那一代青年所唱的“青春之歌”，表达崇高而美好的爱国之情。

谢芳所扮演的林道静，更是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典型人物。崔嵬和陈怀皑曾说：确定电影以林道静命运为主要线索，情节选择和结构便围绕这个关键人物进行。如此，电影中的余永泽、卢嘉川、江华，就是对林道静成长不同时期的标杆人物。反映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一幕是全员高潮。林道静、江华、王晓燕以及无数北大师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，和群众一起行进，气势雄浑，成为

观众心中的经典镜头。拍摄那一天，清华、北大数千名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都参与了演出。林道静一手把住电车门，一手挥动着，高呼：“大家不要怕这白色恐怖，团结起来，同学们，冲啊！”谢芳说，台词是她自己设计的，也是她由衷的心声。

“如果说《青春之歌》是面对时代，《舞台姐妹》是面对社会，《早春二月》则是面对人生。”电影理论家钟惦棐曾这样评论谢芳主演的“青春三部曲”。《青春之歌》谱写了那个时代的青春之歌，上映后，观众来信如雪片一般飞来。但拍摄完毕就返回武汉的谢芳，是若干年后随团出访日本、看到街面上竖立着一人多高的林道静海报时，方才意识到角色如此深入人心。如今，在青年人喜爱的视频网站上，《青春之歌》依然不乏知音，“革命者的青春最有光彩”被网友顶上高赞评论。

“青春之歌”已经成为颇有象征意义的词汇。作家杨沫曾说：“青春应当是鲜红的，一个人只有把他的生命和时代、和祖国、和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，生命才有意义，才灿若星辰，才不虚度年华。”《青春之歌》启示着新时代的青年，应该树立怎样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如何将个人的价值与时代相生。“一个时代重要的是靠青年人去创造，我希望更多年轻人拿出林道静的力量、青春的力量，努力创造新的时代！”这是谢芳的心愿，也是《青春之歌》的呼唤。

文艺评论